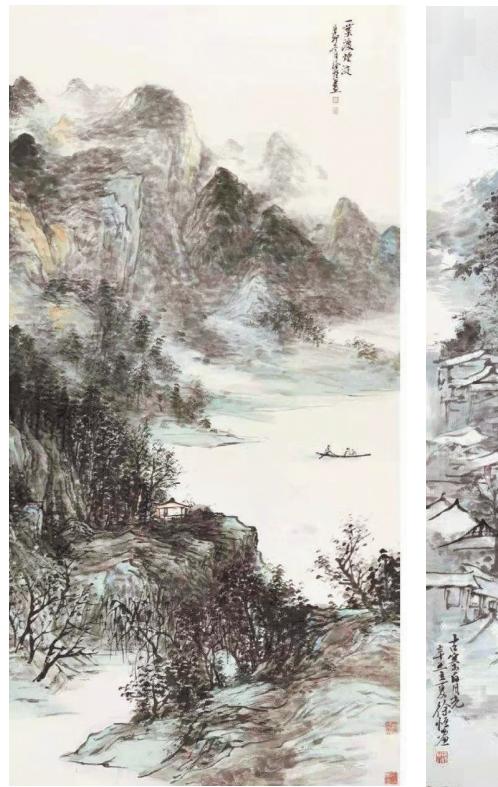


山水开合呈气象 出尘入世点画心

——徐恒山水画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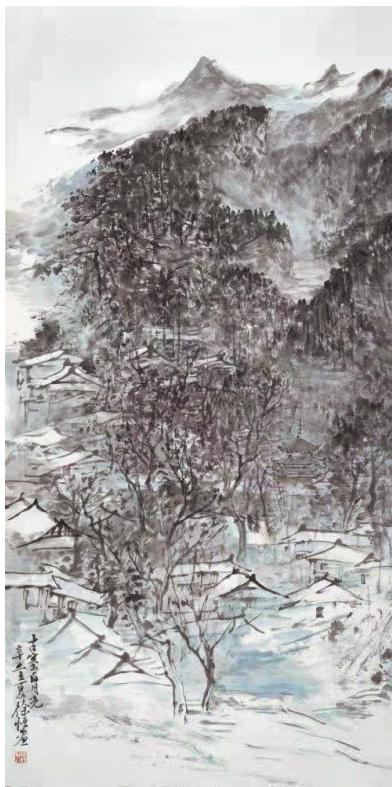
刘晓婷



徐恒作品。

徐恒，著名山水画家，贵州省美术家协会主席，贵州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协会员。山水画少不了山水，徐恒的画以山水为宗，巨帙不尽繁复，小帧也非简略。

其所画之山——雄浑。至大至刚，山峦叠嶂收摄寸纸，整体精神豁然入目，有一种顶天立地的不屈之态。所画之水——灵动。江河、湖泊、溪水、山泉，浩瀚可如烟波，细微可如雨丝，但无一例外地显现了水的生命动感，将万物的灵性孕育在这生命的激荡和碰撞之中，静中生动，动归于静，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如《黔中胜境》《江山如画》《云顶飞歌》《林壑深处流泉送日月》等作品都显现了这样的气象，山脉有如龙脊，有横卧式、腾空式、回首式等，“山鬼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桂旗”。一时间乱石怪生活力起来，神鬼意象喷薄而出。《山高水长》《夜郎湖》《湖广清远》《石上流泉》等作品则



显示了水的动静之美，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皎若太阳升朝霞，灼若芙蕖出渌波”，河伯洛神也尽显其真身。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有生命的画中，可以悠游自在，得仁者之善，得智者之慧。一幅作品不仅要有懂美的画者，也要有懂美的观者，作者和观者是一幅画的一体两面，故而观画者也需要提升审美趣味才能看明白一番究竟。宋代青原行思提出了人生的三重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第一阶段，山水只是外在的山水，人与山水处于二元对立的关系，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分离。有无、生死、是非、悲喜、贫富、贤愚、美丑处于固有之困境，笔墨山水未尽中心山水。第二阶段，好似打破了这个固有的标准，却寻不见“真实”的那个标准，处处去寻，却越寻越远。云在山头，登上山头云更远；月在水里，拨开水面月更深。第三阶段，当内外明澈，觉自

性在心中，山水在心中，处于“无我”之境，万物齐同，天地与之共生，万物与之为一。“天人相际”便成为“天人合一”。这时人在画中，画在心中，这便是心物圆融，艺术之高下，终在境界。

所画之云——变易。笔之缥缈，全在烟云。在中国山水画中，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舒卷自在，变化万千。如何将阴雨晴晦，四时朝暮之云跃然纸上，身即山川而取之是必然之法，同时要将自己也处于一个“变”的空间，移步换景，接受山水的召唤，接受流云的召唤，画者的心灵因与山石流云感应而互洽，感而遂动，一切自然而然，心中山水便俯仰自得。《黔中胜境》有一条流云环绕在贵州群山之中，表独立于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白龙吞吐云雾，气贯山河。在《云山居》《云锁清溪》《高山种白云》这类画作中，所呈现的云大多是山峰入云，山峰萧然有出尘之姿，浮云杳霭于江天之外。从视角上是一种“高远”的观法。“高”和“远”是两种视觉空间，同时也是两种精神境界，都是对于空间局限性的超越，在观照自然山水的时候，物理空间是必要的，但是心理距离更为重要。“高”是一种对纵向的突破，是一种虽不在云端而又在云端的立足。因为高，所以一览众山渺小，素日硕物因视域之“高”而成片影，这就突破了视觉的障碍，大与小的常见被超越了，更大的空间得以显现。“远”的精神是一种最大限度超越现实功利的自由精神，令人有出尘之念想，徐恒的画虽有一种隐逸出世的情怀，像《万水千山隔尘嚣》《云山居》，但这不是山林的逃避，是一种庄子推崇的“无遁而存”，是“无隐”的人间世，即隐在人世之间。是将山水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所谓心远地自偏，“偶得幽闲境，遂望尘俗心。始知真隐者，不必在山林”，心远比行远更重要。还有一些作品也呈现出浓厚的人间烟火，比如《云上人家》《苗家高寨》《锦屏写生》《白云生处有人家》等，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即不离是一个艺术家自我圆融的心法。一幅好的山水同样也是可以启迪人的生命境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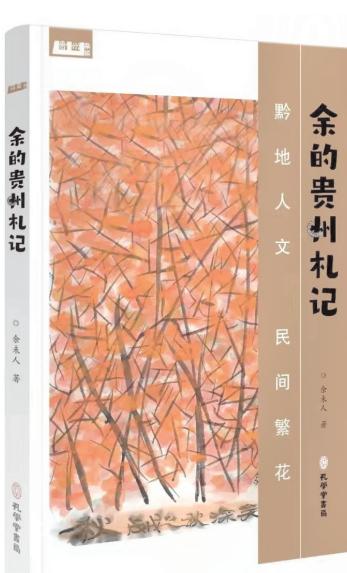
所画之村落——静谧幽深。苗乡侗寨是徐恒常作题材，《剑河苗寨写生图》《苗山初雪》等画，喜用墨之干湿浓淡体现境之虚实相生，这个“实境”也并非仅指外在的具象，而是去除遮蔽，真实具现的内心观照，是外境与心的妙然契合。画中的雪村常显幽绝之境。

徐恒的画有骤雨初歇，拂晓横江，晚霞残照，松下流泉的艺术题材，有气韵生动，师法自然的传统理念，有阴阳五行、动静结合的哲学思想，有生与寂、显与隐、高与古、空与有、至善与独善、出尘与入世的艺术观想，这不是对立与辩证，而是突破与超越。善画者是明于法之中，超乎法之外。作画、观画可陶冶性灵，变化气质，不知不觉，久而久之，美在其中也，这不是教，而是化的艺术。

平静而山高水长

——读余未人《余的贵州札记》

陈家榆



余未人创作的《余的贵州札记》是此前在动静APP上同名专栏文章的结集，以类相从，共65篇。她以一个作家的笔触与行者的视角刻画了多彩贵州的山乡画卷，展示了黔中大地的民俗技艺，挖掘了牂牁故郡的民族史诗。

绿叶对根的情意

余未人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她笔下的贵州风物浸润着一种寓于平淡中的乡情，开篇的《三句民谣谱贵阳》就对“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民谣进行了回应，“黔地芳华流韵”这组文章呈现了多姿多彩的故乡。这座城市海纳百川、风情万种，清澈秀美的南明河、野性灵动的黔灵山、文化盛景相宝山都在她的笔下流溢出别样的光彩。余未人想要打破黔地给人的闭塞落后、穷苦蛮荒印象，从客居龙场驿的王阳明写到

让她结识了水城农民画的发掘者，也是后来《六盘水民间美术图志》的编纂者汪龙舞，札记中《六盘水的傩艺艺人》一文就刻画了为普查农民画执着付出13年的汪龙舞以及用30年自建石棺的马星朝这两位傩艺艺人，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傩艺”令人动容。值得关注的是这篇文章在动静客户端首发的时候并没有留下马星朝的名字，只是记作“马师傅”，而收录本书之后作者特意将他的名字写出，这一细节也显示出余未人田野记录的细致和对老艺人的尊重。2009年起她先后发掘整理了苗语西部方言区的三大古歌《亚鲁王》《簪花传》《米花古歌》，这无疑对研究苗族的历史、文学、民俗等相关学科有着重要价值，札记中《亚鲁王史诗的世代传承》《贵州地域的远古神话簪花传》《“米花古歌”的天才歌师》几篇文章不但回顾了举步维艰的搜集翻译工作，还反思了这些作品普及传播的困境。现在《亚鲁王》和《簪花传》的整理和非遗申报工作已经完成，而《米花古歌》的翻译还在进行中。长篇民族史诗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记忆和文化瑰宝，我想以余未人为代表的贵州人正在用他们的实际行动拯救贵州少数民族的文化灵魂。

新时代的文化长征

余未人在《锡片剪丝绣盛装》中写道：“要想看到非同寻常的手艺，就得跋山涉水，钻进大山深处。”她的文章的确是写在贵州大地上的，余未人一直在行走中丈量着黔山秀水。眼前这本《余的贵州札记》既是一本散文游记，又可以视作田野调查笔记，其知识量、信息量都颇为可观。发掘贵州的民族民间文化是这些年她不辞辛劳、亲力

亲为的事，从札记中可以看到她的足迹遍及各个地州市，深入田间地头做了海量的田野调查。这里面有我们有所耳闻的安顺地戏、侗族大歌、苗族飞歌、布依族《好花红》……更多的是还不太了解的彝族“铃铛舞”、撒泰吉、仡佬族舞毛龙、侗族踩歌堂……余未人以一种充满烟火气息的平民化叙述，让一般读者产生极强的融入感。雷公山终生难忘的苗年、水族端节上铜鼓的浑厚响亮、西部赛马之乡三都的“挤马”腾跃，这些情景宛在目前，引人入胜。

余未人曾说自己始终是个凭兴趣做事的边缘人，在一般人看来，田野作业是辛苦的，但在本书的字里行间，她走乡串户收获更多的是喜悦与兴奋。紫云自治县四大寨乡，近40年前所绘的访谈对象被人认出时的欣喜；盘州羊场，同吴廷贵及两位青年歌师交谈的愉悦；安顺蔡官，听蜡画艺人杨金秀说出“学画直线更难”的出人意料……一路走来，余未人承担着一个非遗卫士的责任，探寻了一个个贵州民族文化的宝库，抢救着贵州优秀的民间传统文化。

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余未人如拾穗者般寻觅着贵州民族文化的遗珍，正因为我们有一批像这样辛勤耕耘，甘于奉献的非遗工作者，一项又一项的非遗保护工作才得以顺利开展。《余的贵州札记》所讲述的这些文人、歌师、匠人、舞者们的平凡生活，恰恰勾勒了贵州这个多民族省份奇丽多姿的城乡图景，是一部精彩绝伦的大众生活史。其浓郁的地域特色，为如何立足自身讲好贵州故事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向世人展现出可信、可爱、可敬的贵州形象。

用心用情用力

写好帮扶干部的故事

——评李文明《北京来的第一书记》

李家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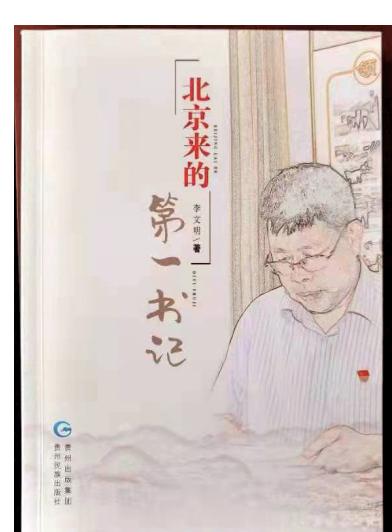
黔东南州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李文明所著《北京来的第一书记》（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项目，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将视点集中在“帮扶干部”这个优秀群体上，集中在解决城市与乡村二元发展模式和融合发展上，聚焦黔东南脱贫攻坚。对于彰显党领导的优秀干部群体的使命担当与奉献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北京来的第一书记”杨端明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干部，从军20余年，因工作成绩突出转业留北京工作，来贵州挂职之前，曾经在吉林省通榆县挂职两年，获得“全国扶贫先进个人”称号。当贵州脱贫攻坚进入白热化阶段，单位又将杨端明抽派到贵州锦屏县挂职。杨端明没有选择留在县里，而是选择直接沉入最基层，担任龙池村第一书记。杨端明和他的同事们给龙池村的帮扶，像一股春风吹动了一池春水，给村里带来巨大变化：农村基础设施得到完善，村容寨貌变美了；基层党组织得到强化，制度得以健全，村民干劲更足了。杨端明和他的团队通过艰辛扎实的工作，赢得了村民的认可和拥戴，也受到了上级的表彰，获得了多项荣誉，其中2017年获“贵州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2018年获“全省脱贫攻坚优秀个人”。

首先，在《北京来的第一书记》创作中，作家李文明发挥所擅长的纪实文学和方志文学的创作能力，牢牢抓住时代的主大题，围绕脱贫攻坚这一国家战略来反映人物，奠定作品的主题和突出人物形象。

作家围绕杨端明从愉快地服从组织的决定，到扶贫困村的选择，确定扶贫项目等，突出杨端明站在脱贫攻坚一线，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贴近基层，贴心群众的优秀事迹。如杨端明观看龙池村小学生用冷水洗脸：“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冬天来了还是用冷水洗脸？’这个问题引发了他深深的思考。”于是，杨端明联系了北京太阳雨公司领导到校考察，捐赠了21.6万元的太阳能热水器，解决了300多名师生冬天用热水问题。这样的事例还很多，作家站在时代最鲜活的场景上，把人物与时代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人物鲜活起来。其内在精神品质与思想境界跃然而出，深深地打动着读者。

其次，我们所阅读的每一部作品，之所以能够长时间映现于读者脑海，在于细致入微的生动细节。作家深谙这一点，用翔实的笔触描写细节，深入到人物内心，挖掘出主人公的内在精神品质，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杨端明被派到贵州挂职之前，他已经有了在吉林省挂职两年的经历，获得了表彰，工作得到过肯定，他也超过了挂职干部的年限，按理说应当选择其他的年轻同志，但



杨端明在组织谈话时，毫不犹豫接受了任务，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敢于面对困难、勇担重任的责任使命。杨端明看到龙池村水果品质好，主动提出联系卖到北京去。结果随车运至北京，其间一路艰难，颇费周折。他夫人说：“你这哪里是扶贫工作啊，简直是在玩命啊。”杨端明亲自上街吆喝，还说动城管划一块地让村民摆摊卖水果；亲自带身患顽疾的女孩到北京看病等等；在他离职前，享受到帮扶待遇并深受感动的村民给他凑了一笔路费，悄悄塞进他的包里，他上了火车才告知他。杨端明分文不收，想办法让这份真情“退”到村民手中。种种细节，无不表现杨端明心里装着群众、急群众所急的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再次，着力于旁证，以大量事实来证明主人公的作风与品质。作家通过杨端明妻子的语言，来表现杨端明埋头于工作的踏实作风，“杨端明是个闲不下来的人，也是个想走就走的人，长年在外，孩子怎么长大的他都不知道。”“周颖丽（帮扶干部）来了以后，听杨端明跟她讲了卖水果的故事，很受感动，动员家人为龙池村捐款80万元。”“冷库建起来了……能够存放五百吨水果。”一个“80后”女孩动员家人捐款80万元，也感动了其他更多的爱心人士，他们或捐资助建村级基础设施，或帮助贫困学生。杨端明发挥了领头雁作用，年轻人则站到前台，成了扶贫工作主力军。

扶贫要取得实在成效，最重要的是扶志。“北京来的第一书记”就是站在一个更宏大的场景上，表现以杨端明为代表的扶贫干部与贫困乡村的相遇相识与思想碰撞，拓展思路，开启民智，让封闭的乡村、贫困的村民与现代化对接与融合。《北京来的第一书记》抓住人才与干部这一关键要素，表现了帮扶干部对黔东南脱贫攻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品读《雅舍谈吃》

刘国琪

一饭一蔬里尝不够的人生百味，一饮一酌间品不完的苦辣酸甜。喜欢“纸上谈吃”“读书先读吃”的我，一本《雅舍谈吃》在手，可谓幸运之至。《雅舍谈吃》是作家梁实秋先生的散文集，共四辑89篇，文章短小精致，字间充满智慧，一边品着文化，一边“回忆生活”，把历史文化、故土乡情、人间真情巧妙地融入文章中，留给读者的不仅是舌尖上的味道，还有文化的味道、故乡的味道和真情的味道。

中国古典美学有品味、韵味、“味无味”的概念，从“体味”到“体悟”，从“物”之味到“意”之味“艺”之味，距离并不遥远。各种美食、南北特色、地域文化在《雅舍谈吃》里得以生动再现和传承。在《两做鱼》中，谈到广东朋友吃鲤鱼一根大刺横鲠在喉只好到医院行手术、江西一位同学鱼身上桌便停不下箸致一根鱼刺贴在嘴角上的趣事。还引用《诗经·陈风》：“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及《本草纲目》说“鲂鱼处处有之”等文学知识。读罢，既读到美食之味，令人口齿生津、馋涎欲滴，又读到文化、故事和

闲情逸趣等“味中味”，增强文学素养、娱乐身心。俗话说得好，“味至浓时即家乡”。作家写“吃”不仅仅只写“吃”，更注重情感的表达。在《栗子》里回忆北平秋节过后街上翻炒栗子的情景：“不是干燥，是用沙炒，加上糖使沙结成大大小小的粒，所以叫作糖炒栗子。烟煤的黑烟扩散，哗啦啦的翻炒声，间或有栗子的爆炸声，织成一片好热闹的晚秋初冬的景象。”在《狮子头》中极富感情地写道：“狮子头是雅舍食谱中的一色。最能欣赏的是当年北碚的编辑馆同仁萧毅武先生，他初学英语，称之为‘莱阳泡菜’，见之则眉飞色舞。化成客死异乡，墓门早关矣，思之恍然。”《雅舍谈吃》中类似这样的记忆，让视觉、嗅觉、听觉全部变得敏感，不免让人想起那故乡的山水草木、人文地理、村间小巷、乡俗民情，这些浓得化不开的乡情，像盐渍刀斫一样深深地渗透在异乡人的心窝里，充满温馨，使生活充满希望。

品读《雅舍谈吃》，闻到美味，看见文化，感悟真情，品出的是不一样的人生味道。